

“棉花——可持续生产的关键要素”

Автор(и): доц. д-р Божин Божинов, от Аграрния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в Пловдив

Дата: 20.03.2017 Брой: 3/2017



正确的品种、机械和技术组合对于棉花种植尤为重要。因此，尽管过去两年种植面积大幅增加，但经济上成功的生产案例却极为稀少。这已经开始导致生产者分化为两个群体。第一类仅依靠特定的每公顷补贴来获取净收入。第二类生产者才是欧盟层面引入特定补贴的目标群体。这些正是那些需要补贴来补充作物主要收入，以达到与其他大田作物相似利润水平的农民。

历史上，棉花作为一种作物在我国的种植面积波动极大——从19世纪初的7000-8000德卡尔，到1953年惊人的1,800,000德卡尔，随后又下降至2014年约3000德卡尔的新低。回顾这些极端波动的原因表明，该作物在国家层面有特殊支持的时期蓬勃发展，而在缺乏支持时则急剧衰退。

尽管气候条件有利于这种南方且生物学上高度耐旱作物的生长，但显然，其他因素决定了它在我国作为作物的成败。然而，其现有潜力早在20世纪初就已得到认可，当时（1932年）在奇尔潘镇建立了一个专门的国立农业试验站并从事种子生产，后来更名为棉花与谷物作物研究所。

由于该研究所、萨多沃的IRGR "K. Malkov" 以及普罗夫迪夫农业大学长期工作的成果，多年来已培育出数十个棉花品种，其中一些已传播到国外 (M. Bozhinov 和 B. Bozhinov, 2010年)。数十位育种家、农艺师和植物保护专家的努力，促成了一个专门品种群体的建立，这些品种 (结合良好的农业技术) 能够在我国的条件下提供高产。在适宜的条件和农业技术下，生产条件下已获得超过220公斤/德卡尔的产量，而在试验条件下并具备灌溉可能时，产量可超过450公斤/德卡尔 (Spasova等人, 2010年)。

如前所述，**事实证明，我国棉花作物成功推广的主要因素之一是其生产能否获得特定支持。** 这个根本性问题的在1990年后的时期变得尤为尖锐，在此期间，种植面积从超过150,000德卡尔缩减至不足3000德卡尔。其原因既包括欧盟以外地区存在通过使用基因工程品种实现该作物显著更高效生产的可能性，也包括欧盟内有竞争力的生产者能够获得针对该作物的补贴。

解决这两个主要问题的方法，已由包括本文作者在内的科研团队提出。因此，甚至在我国加入欧盟之前，第一个保加利亚生物技术候选品种就已开发出来，并提交给IASAS系统进行测试，其创建旨在解决该作物的一个主要问题——对抗早期杂草侵害。遗憾的是，由于我国加入欧盟，该品种的注册和分发变得不可能，因此其开发 (以及其他类似品种的开发) 被中止。另一方面，保加利亚生产者与其他欧盟农民平等待遇的问题被提出 (Bozhinov和Bozhinov, 2010年)。尽管多年来该问题得到了部分解决 (通过上一个CAP规划期的微量援助计划)，但这些支持水平被证明对于维持生产者的兴趣是远远不够的。

获得与其他欧洲生产者相同支持的可能性，随着新的CAP规划期的开始而出现——从2015年起，**欧盟第1307/2013号条例**赋予保加利亚提供棉花特定每公顷支付的权利。该特定支付的金额在条例中设定为2015年584.88欧元/公顷，2016年及以后年份为649.45欧元/公顷。获得此特定支付的条件在**2015年2月17日关于直接支付计划申请条件 and 程序的第3号法令**第17条中规定，并简要表述为以下要求：(1) 使用在保加利亚共和国品种名录或欧洲目录中注册的品种；(2) 达到至少8000株/德卡尔的最低播种密度；(3) 在12月1日前提供已签署的购买合同。在欧盟第1307/2013号条例本身中，还有一个附加条件，即——每公顷金额仅在达到所谓的“基础面积”之前有效，我国的基础面积设定为3342公顷。如果某一年符合援助条件的面积超过设定的基础面积，则指定金额将按超出基础面积的比例减少。

随着获得可观金额特定支持的可能性出现，保加利亚生产者对棉花的兴趣急剧增加，2015年面积已达到超过27,000德卡尔。2016年，申报面积已超过51,000德卡尔，这意味着预期的支持水平对农民极具吸引力。然而，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由于超过了基础面积，每公顷棉花的特定援助金额非但不会增加，反而会根据条例的要求减少。2016年的确切金额尚待国家农业基金完成对符合条件作物面积的数据处理后确定，但已经清楚的是，该金额将显著低于前一年。

这种情况使得农民需要非常谨慎地决定是否以及在2017年种植多少面积的棉花。乍一看，该作物继续成功推广有许多先决条件。其中包括在国家品种名录中注册有足够数量的保加利亚品种 (18个)，以及在**欧洲大田作物目录**中注册的品种 (超过180个)。另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是拥有足够现代化的、可以轻松适配的机械 (例如播种机、中耕机等)，以及可以从邻国希腊以相对较低价格购买的机械。

然而，邻国希腊的农民近年来大幅减少棉花种植面积这一事实本身，就应该引起生产者的警惕。两国的条件差异足够大，无法进行直接比较，但希腊农民的反应表明事情并非那么简单。

这方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是品种的丰富多样性。虽然乍一看几乎无穷无尽，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表面现象，因为真正适应我国实际种植条件的品种范围极其有限。自我国变革开始以来，不断尝试引进国外品种——既有来自希腊、土耳其的，也有来自美国的——但迄今为止所有此类尝试均告失败。顺便提一下，相对令人满意的结果主要是在希腊品种上取得的，而这些品种的培育有老一辈保加利亚品种的参与。因此，在选择种植品种时，生产者（尤其是那些刚刚接触该作物的人）向真正合格的专家寻求帮助，避免简单地接受互联网上或来自随机渠道的信息，这一点非常重要。

这一建议既适用于品种组成的选择，也适用于选择种植该作物的技术（以及相应的技术设备）。例如，在世界范围内广泛采用的行距超过85厘米的种植方式，在我国已多次试验，并始终证明其效率低下。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许多生长调节剂和农药，它们在灌溉和非灌溉种植条件下的推荐使用方法有很大不同，因此很少适用于我国。

正确的品种、机械和技术组合对于棉花种植尤为重要。 因此，尽管过去两年种植面积大幅增加，但经济上成功的生产案例却极为稀少。这已经开始导致生产者分化为两个群体。第一类仅依靠特定的每公顷补贴来获取净收入。尽管在2015年这带来了积极结果，但到2016年，情况可能因支持水平的确定而对他们发生逆转，也就是说，这类生产者（我们将其定义为“补贴依赖型”）的做法非常不稳定，这是由于纯粹市场机制的作用——他们的数量将增加，直到补贴金额低于创建和维持达到强制最低密度作物所需的最低资金。

第二类生产者才是欧盟层面引入特定补贴的目标群体。这些正是那些需要补贴来补充作物主要收入，以达到与其他大田作物相似利润水平的农民。这些生产者的做法更具可持续性，因为它依赖于将日益高效的生产与欧盟的额外支持相结合。正是这些生产者将能够在当前CAP结束后继续棉花生产，届时（正如已经变得清晰的那样）对农民的总体支持水平将会下降，而棉花的特定支持金额（以及是否还会有任何支持）仍将存在争议。

在此背景下，利用2020年前可用的支持，为每个农场建立正确的品种、机械和种植技术组合显得尤为重要。